

# 新文科视野下的大学通识教育

李凤亮 陈泳桦

**摘要:** 新文科为应对优化学科结构、培养创新型人才、协同解决全球化事务而提出,大学通识教育是新文科开展的重要载体和途径。本文针对当前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创新培养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大力推出“金课”、强化“硬核”能力的策略,形成探索新文科发展的新格局、新观念、新方法、新模式和新路径。

**关键词:** 新文科;通识教育;共同体;跨界融合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16

2019年8月26日,教育部倡导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文科”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是主动拥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的“先手棋”<sup>①</sup>,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新使命、新担当。20世纪,为应对新时代、新需求,改变当时分割式教学、条块化管理和碎片化思维的教育状况,西欧各国曾大力倡导和普及通识教育,变革人才培养的思维和模式。新文科在百年变局与全球化进程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产生,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厚基础、宽口径、专业化、创新型的复合性人才成为新的时代需求,“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人才和学科发展新方略。就新文科建设而言,未来可望在发展交叉学科、培养复合人才、创新话语体系、推动智库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在此过程中,发展通识教育,不仅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新文科的重要抓手。

## 一、大学通识之弊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译“博雅教育”),在美国发扬光大。1945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推动本科生课程体系改革,发表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中国近代,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也曾倡导过“通才教育”,他在《大学一解》中认为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sup>②</sup>。学者张亚群认为梅贻琦所提“通才教育”与西方所提“通识教育”是同义的<sup>③</sup>。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总的来说通识教育有几层内涵:一是旨在将学生教育成“社会公民”,二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跨专业学科的教育,三是不以教育结果为目的、以人为本的全面教育。其与我国20世纪末兴起的文化素质教育一脉相承。虽然两者产生背景殊异,但两者的教育目的与途径一致。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均要求学生既能融会贯通,通达不同领域的知识,又能整合所学知识,注重内外兼修,提倡全面发展。通识教育在我国快速推广,不仅推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还成为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整体来看,通识教育仍然存在着诸多值得警醒之处。

**作者简介:** 李凤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 518055; lifengliang@sustech.edu.cn);陈泳桦,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深圳 518060; cyh\_910@126.com)。

① 李凤亮:《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② 梅贻琦:《大学一解》,1941年6月,转引自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37页。

③ 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36-137页。

### (一) 认知偏差

对什么是通识教育、是否需要推进通识教育、如何推进通识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界还未达成完全共识。基于国内教育发展历史沿革,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还带有工业化进程中培养分科人才的显著特征,即强调培养专业型人才,对于通识教育在层次和阶段上存在较大分歧。陈跃红教授2009年提出大学通识教育应放在初高中阶段完成,大学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深度思维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sup>①</sup>。马晓春教授针对陈跃红教授提出的通识教育阶段前移提出不同意见,指出通识教育应是全人教育<sup>②</sup>。两位教授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偏差是学界对通识教育之用的不同理解。前者认为当前大学通识教育流于表面,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学术修养提升没有裨益,应将面向广度的知识构建放在初高中阶段完成;后者则认为通识教育理应成为贯穿现代人一生的教育。总体而言,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大学通识教育产生认识偏差:一是认为通识教育可有可无,可强可弱,部分学者基于大学通识教育良莠不齐的现状,对大学通识教育知识扩展和视野拓展存疑,认为通识教育只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调剂,而非大学教育的关键环节;二是专业本位主义,强调学生应该深耕于专业领域,而不是各种知识都浅尝辄止;三是认为通识教育职责限于某些特定部门或学院,某些人认为大学通识教育仅仅是大学个别部门的事情,如文学院开设导读课、艺术学院赏读名画等,对于通识教育的认识还局限于知识普及阶段;四是认为通识教育只是知识的传授,老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深入交流,学生与社会之间脱节,缺乏实践支撑。

### (二) 操作失误

大学通识教育本来肩负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历史遗留导致的分科、分类积习,大学通识教育成为脱离于专业教育的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一是教学模式单一,目前国内通识教育多采取大班教学的方式展开,教学模式固化,学生参与度不高,存在为了学分而选课的被动局面。二是课程设置受社会氛围影响,例如一个时期大众对于国学的热情高涨,导致国内大学开设国学通识教育课程增多,但是这些国学通识课多置于大学语文公共课这个层面,学生上课体验感和获得感均与其预期相悖,导致多数学生视大学通识教育课为质量不高的“大课”。三是课程设置不合理,国内许多大学通识课缺乏系统性规划,课程设置上欠缺跨界融合意识,未能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导致学生能选、想选的课程不多。四是监管缺位,大学通识教育课多数被置于公共选修课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评估手段,导致大学通识课成为学生混学分的重灾区。

### (三) 多元之难

国内大学通识教育目前尚缺乏统一设计和整体规划,总体上处于各自探索的状态。例如,复旦大学建有“复旦学院”、南京大学设有“匡亚明学院”、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等,各高校现有的通识教育呈现多向探索的发展态势。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这种多元化的通识教育发展模式,不利于形成示范效应,同时各高校在通识教育的特色凝练上也尚未有显著成果。这种大学通识教育发展面临多元、复杂的格局,制约我国新文科建设战略布局。一是难以满足不同类型大学的需求,我国高校的办学层次不同、办学方向不同,导致各个大学的学科设置不同,对通识教育的需求也应不一样,但目前却有“千校一面”之感。二是难以满足不同专业的需求,不同专业的培养方向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也不尽一样。但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的却是“广谱型”通识课程,难以精准适应不同专业的知识结构要求。三是难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学生的家庭背景、个人兴趣、知识储备不同,加之目前高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总量有限、品类不足,导致学生在按需择课时往往产生缺失感,其个性化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这种态势下,2015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校共同发起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联盟旨在加强高校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合作、促进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推动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目前有52所高校加入该联盟,联盟运行时间不算长,以联盟形式

<sup>①</sup> 陈跃红:《大学通识教育面向广度还是面向深度》,《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

<sup>②</sup> 马晓春:《通识教育应是全人教育——与陈跃红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促进通识教育共同发展的效果令人期待。

#### (四)知行不一

国内通识教育整体呈现“通”之不畅、“识”之不足的状态。造成这种现象,一是由于大学通识教育未能突破各自的学科壁垒,不能凸显跨界融合的倍增效果,高校在开设大学通识课的时候未能充分考虑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造成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联度不高,造成学生知识广度短板明显。二是由于大学通识教育课内容浅显,在专业深度上显示出不足。目前通识教育呈现出知识灌输的发展态势,未能和学生形成有效的课堂互动与知识探讨,有违通识教育“纵横贯通、内外兼修”的初衷。三是现行通识教育教育缺乏实践意识,学生对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方面认识模糊。学生初入社会对将要从事的工作适应能力不足,造成学生“学而不能用”“学而不会用”的尴尬局面。

## 二、提升通识之思

新文科建设对我国通识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不仅能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解决学科细分问题,还为应对教育改革提出新要求,为新时代人才培养设置新规格。新文科建设是对大学教育体系的一种增补、转型和更新,是为解决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全球化问题所形成的新格局、新观念、新方法、新模式和新路径。大学通识教育是新文科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支撑。

#### (一)形成“跨界融合”的新格局

要以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去重新认识世界,关照现实问题。当前世界面临“日益突显出严重的‘文明病’症状:超级智能隐忧、基因技术隐患、生态危机、地缘政治与单边主义、文明割裂、思想隔绝、逻辑变异、秩序丧失、物奴现象与后物质主义并存,以及人性的退化、心智的弱化等”<sup>①</sup>,已经无法用单一学科或单一思维去解决,要以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去弥合生态和文明的割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大学通识教育能发挥出各个学科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能有效促进学科之间的跨越和融合,起到推动各个学科发展的提质增效作用。“跨学科”按照学科组织方式,从学科的概念、形式、特征、理论和方法出发,从分科治学到科际融合,重视学科间性,重组学科内部结构;“超学科”不仅指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还包括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还包括“专业内”学者与“专业外”的各行各业人士的跨界合作,因此他代表着更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跨学科”<sup>②</sup>。“超学科”是为应对当前全球化、现代化、复杂化、个性化的社会问题而提出,需要用跨媒介的方法、跨文化的思维去重构教育方针和教育体系;“共同体”思维将世界作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融合,以国际视野应对全球范畴出现的多样化、复杂化的局势,以减缓生态文明冲突、世界治理纷争和精神文明冲突等问题。

#### (二)强化“以人为本”的新观念

通识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将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现代思想产物,但对人类本体性和主体性的关注和肯定,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肯定人的价值。在西方的历史中,人的主体意识又不断地将人从神学、宗教和世俗观念中解救出来。中国哲学主张“天地人一体”,人的主观意识不可或缺,成为推动万事万物和谐发展的力量。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就能认识到,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在他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他也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理念<sup>③</sup>。在现代社会,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更加重要,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在后人类主义情境下探索人类

① 刘洪一:《文明通鉴与普惠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 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③ 戴维·麦克劳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的主体意识尤为重要。在现代生态网络中,人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如何认识自我和重塑自我,还将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发挥人的协调和治理能力。首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观照人与自然的历史、当下和未来,以寻求两者发展的平衡点。其次要处理好人文和科技的关系,科技既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推动人文发展,人文反思科学发展,科学向前观照前沿问题,人文往后诠释与重塑人的伦理、审美等经典化命题;科学又作为对象,与人文协同分工,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学生主体性是人类主体性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强调学生主体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还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情感、道德价值等主观能动性,重视因科技快速发展而忽略对学生美育和人文素养的培养。

### (三)创生“资源整合”的新方法

一是要整合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不可估量的生产要素,也是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整合文化资源要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共同着手,横向上,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和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以共同的文明公约打通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并培养通晓国际文化和国际礼仪、具备跨文化视野的文化人才;纵向上,以文化为本位,以创新为导向,让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并培养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创新意识文化人才。二是要整合社会资源,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社会的引领和整合作用。传统的教育观念是以教师为主体,以学校为教育发生场所,这就导致教育的单向性和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同时,还应整合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多方资源,探索范式创新,将社会、企业和政府等资源引入高校,探索产学研政一体的学习模式;充分发挥现代媒介和现代技术优势,搭建实验平台和学习平台,跨越时空的界限,实现“人人可参与,时时可参与,处处可参与”的无障碍式学习。通识教育是整合知识资源的一个重要抓手,其摒弃了以往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架构,而是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架构,创设师生共同探讨“问题解决式”新型课程,并培养知识复合型人才;整合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发挥理论的应用能力,深化实践的理论意义,运用交叉知识,积极探索知识创新和知识融合。

### (四)建立“强化实践”的新模式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量子力学、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催生了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发展,由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所引发的生活方式、思维范式和学习模式的转变呼唤学科的内在改造、升级和转型,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产业和新业态迫切需要跨学科和重实践的复合型人才;与此同时,外部世界风云巨变,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国际事务失序等问题逐渐凸显并且愈演愈烈,脱离社会现实且视野局限的人已经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要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能力参与到国际公共事务和社会服务之中,创设新时代、新生态、新语境。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通识教育发展,注重打破以往只关注自身学科内部发展的局限性,提倡与历史和世界同步,以跨界融合为定位,以实践为导向,与新科技相融合,探索创新范式,生成新文科的新内涵和新意义。

### (五)构建“创新为体”的新路径

创新是新时代的内在呼唤,科技的发展催生了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科学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不能只做单线程思考,而要有一个多线程的思维模式,去重新看待世界的本质和文明的本质。文化产业化的趋势呼唤新业态的产生、提升对文化的重视和对经济消费的需求。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等引起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产生新的学科和新的生活形态。这些变革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要求我们持续更新观念,用科技逻辑和人文逻辑共同思考,提供文化科技创新动能。大力发展通识教育就是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一是需要拓宽学生的知识广度,使学生不再囿于自己专业的窄小天地。二是需要提升学生的知识深度,使学生在了解别的学科的同时,对本学科产生新的认识、新的想法。

### 三、未来通识之路

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各个领域之间沟通交流频繁,尤其在教育领域,各个学科之间交叉互融趋势明显。为适应新变局、新业态和新挑战,打造一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才队伍已成为当前教育的重要使命。

#### (一)创新培养理念

大学通识教育本质上是贯通、通达、融汇各门类知识,着重培养学生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能力,提高学生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构建复合型人才、跨界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一是要构建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兼备的人才培养机制,国内现有 14 个省份开启高考改革,大方向是打破文理分科。但是,学生进入高校后依然要面临选择专业方向的问题,部分高校试行大二再选专业的“大类招生”模式,但是文理科之间依然泾渭分明。如上海大学在 2011 年就推出了不按专业招生机制(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除外),招生只分文理科。新生大一期间将统一接受通识教育,一年后再根据高考成绩和综合情况,采取学院、学生双向选择的方式安排专业,那些难以吸引学生的院系,则会引入淘汰机制。这种机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需求,但是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割裂依然存在。未来全球变局加剧,科技与文化之间融合发展趋势明显,专才培养模式已不能有效满足整体社会发展需求,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兼备的人才将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要健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随着全球新技术变革加速推进,大数据、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嵌入日常生活,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对人才的适应性提出新挑战、新要求。现有大学教育模式依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再培训、再教育成本增加,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大学通识教育的通达效用,一方面使学生清楚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从而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备较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推动学校重构教学体系,提升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接驳能力。三是要构建通识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整合机制,改变当前通识教育边缘化现状,将通识教育作为大学各个学科之间融合的催化剂,依托通识教育的纵横贯通优势,促进学生对自身专业的再认识、再思考,提升学生专业化水平。四是构建跨界人才供给机制,跨界融合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科技+人文”“科技+金融”等跨界融合发展已渐成趋势,但跨界融合面临复杂的内部、外部制约,需培养具备通晓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据预测,2021 年中国 VR/AR 市场规模将达 544.5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95.2%,但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短缺成为 VR 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sup>①</sup>。现有的专才教育已经难以支撑跨界融合发展的需求,复合型人才紧缺难题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掣肘,因此培养跨界人才、复合型人才势在必行。

#### (二)改革教学内容

为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变局,需要贯彻落实教育部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教育改革精神。一是要倡导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在 20 世纪曾风行日本,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从学问、道德、艺术、宗教、体育和生活六个方面构建了一个整体的全人教育培养模式,并将六个方面对应于真、善、美、圣、健、富的价值追求。这与东亚文化圈儒家所提倡君子“六艺”所追求的“全人教育”在思想维度上有着内在联系。君子“六艺”指礼(道德、宗教)、乐(艺术)、射(体育)、御(生活、体育)、书(学问)、数(学问)。全人教育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教育体系,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东亚文化圈提倡全人教育,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и́нский)也提倡“全面和谐教育发展观”,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面发展。可见,全人教育是人类发展的一个

<sup>①</sup> 朱磊、戴林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短缺成 VR 产业发展主要瓶颈》,《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25 日。

共同目标。二是健全批判思维教育,批判性思维是以问题为导向,注重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全过程思维培养。在此过程中,老师要注重“启”,注重问题设计,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具备思辨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要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更加重视对学术认知过程、情感动机、人格价值观等非量化因素的评价。三是提倡全球观教育,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国交往紧密度进一步加强。中国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就是对全球化趋势的精准研判。在此背景下,加强通识教育有助于学生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全球化观念,培养具有跨界思维、独立思考和共享精神的人才,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是强化实践教育,新文科背景下的通识教育有别于传统的通识教育,更加注重实践的作用。学生在实践中发现自身短板,重构自身知识结构,做到将知识融会贯通,并做到学以致用,努力实现自身全面发展。

### (三)大力发展“金课”

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在这份指导性文件中提出了对各高校课程内容的全面要求,做到“淘汰‘水课’、打造‘金课’”。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也必须大力打造“金课”,应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注重师资知识结构的多元性,突出跨界融合的特征,强调学生自主性、能动性和实践能力,拓展学生全球化视野,提升学生知识整合水平。一是要强化“金课”的互补性。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05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40所,含本科院校1272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成人高等学校265所。本数据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sup>①</sup>。国内高校办学层次、办学历史等差异较大,为提升国内高校通识教育整体水平,提倡差异化“金课”,有助于激发高校创新活力。如医学院等高校可以多开设艺术和人文领域的“金课”,在拓宽学生视野的同时,还能促进学生对专业领域的深化理解。从医学与美术跨学科产生的“医学美术”这一新学科可以看出新时代对于新学科的诉求和内在呼唤,随着技术进步,医学美术与传媒专业相融合,用传统大美术创作手法与新传媒技术相结合,将医学的概念和内涵用生动直观的视觉语言表达出来,更能加强人们对医学的理解。二是要提升“金课”的整体性。雅斯贝尔斯认为,“专门的学科只有作为知识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离开了科学的整体,孤立的学科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sup>②</sup>。高校开设“金课”,一定要强调“金课”的整体性思维。“金课”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抓手,着重培育学生的系统性思维。要改变以往通识课与专业课不相关、零散碎片化的状态,加强专业课与大学“金课”之间的联系。如上所述医学院开设艺术类“金课”,有利于形成两者的融合发展,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水平。以整体性为考量重构大学通识课程设置,将设置“金课”当成系统性工程来做,对培养复合型人才有极强的促进作用。三是要突出“金课”的跨界性。一方面,跨界思维有助于解决多领域协作问题;另一方面,跨界融合能产生新业态,提供发展新动能。如前所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制约着中国VR产业发展,中国不仅面临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还面临人才短缺的窘境。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人们的工作内容已经与传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有了很大的区别,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跨界融合将成为社会发展助推力,如随着5G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与汽车跨界融合,催生出无人驾驶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些融合能极大提高人驾驶汽车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大力推广“金课”,突出“金课”的跨界性,加深学生对社会新业态的认识,将有助于学生培养跨界融合意识,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四是要体现“金课”的创新性。首先,在课程内容上侧重知识结构与内容的前沿性,瞄准高精尖前瞻性课题;其次,在课程形式上展现先进性,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仍然是“金课”的主阵地,慕课(MOOC)、虚拟仿真教学(VR教学)、社会实践

<sup>①</sup> 《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007/t20200709\\_470937.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007/t20200709_470937.html), 访问日期:2021年5月5日。

<sup>②</sup>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课程等课程形式有机补充,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式教学形式,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实现学生学习时间、学习空间、教师资源、课程资源的分配转变和有效整合。

#### (四)强化“硬核”能力

大学通识教育有利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跨界融合的认识,从而培养其自身的“硬核”能力。一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通识课注重以问题为导向,转变以往以学科为导向的传统,注重以老师启发为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知识整合能力,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链”式发展使得社会协同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对未来人才的要求不再满足于习得一门知识,而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旺盛。培养复合型人才就是培养人才的知识整合能力,培养能突破现有学科壁垒的“破壁者”。很多发明创造需要这种“破壁者”,如在抗生素还未普及的时候,1932年德国病理学家格哈德·杜马克在工业颜料中试出了首款商用抗菌药。与之相对应的是,2020年人工智能首次发现强效抗生素。据《自然》报道,一项开创性的机器学习方法从1亿多个分子中发现了强大的新型抗生素。<sup>①</sup>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离不开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三是跨境交流能力,我们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传播速率加快导致现代人对信息的共享需求增多。大学通识教育着重强调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开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没有哪个国家能关起门来发展,中国也在积极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提升跨境交流能力,对国际大循环格局发展形成有力支撑。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中,跨境交流人才紧缺,如在大湾区战略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具备跨境交流复合型人才需求加剧。区别于以往只关注自身领域发展的教学模式,大学通识教育能有效促进学生对全球化的认识,既有利于学生树立有针对性的个人理想和职业规划,又能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技术“卡脖子”等问题。

新文科背景下的通识教育更加强调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和新需求,呼唤具有跨界融合思维和实践行动能力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新时代创新型人才要有新担当、新使命,以全球化视野和命运共同体思维深化新文科新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

##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Liberal Arts

Li Fengliang Chen Yonghua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P.R.China;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P.R.China)

**Abstract:** New liberal arts is proposed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discipline,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ollaborate in solving global affai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innovative educational concepts, reforms teaching contents, vigorously introduces golden courses, and strengthens the hard core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so as to form new patterns, new concepts, new methods, new models and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General education; Community;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邵世友]

<sup>①</sup> 文乐乐:《人工智能首次发现强效抗生素》,《中国科学报》2020年3月3日。